

2501

少城文史資料

第十輯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少城文史资料

第十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成都

少城文史资料（第十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学 习 文 史 委 员 会 编

（成都市王家塘街49号 610031）

内部准印证成都字第3451号

成都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厂址：成都市文家巷

开本 32 印张 5 字数 103 千字

工本费 3.50 元

目 录

“川西边地下党留蓉临时工作组”活动回眸·····	邹趣涛 (1)
十八军川西剿匪及进藏准备·····	魏 克 (10)
忆革命先辈——赵家三杰·····	赵晚珍 (15)
老红军忆峥嵘岁月·····	曾广文 肖悦文 (21)
滴水入海 图呈吉祥·····	王 涛 (29)
刘文辉在起义前夕·····	夏祥烈 (33)
抗日英烈与革命志士 ——小记王甲本、王甲纲昆仲的生平事迹 ·····	王沐云 (40)
“民革川康五魂”之一的李宗焯·····	王大炜 (45)
名扬中外的川菜——陈麻婆豆腐·····	肖慕良 曾成志 (49)
成都名特小吃琐记(续)·····	熊志敏 曾成志 (56)
成都最早联营的建群铁工厂·····	米庆云 (61)
成都市区理发行业的发展回顾·····	陈治儒 (66)
六年兴覆话匆忙 ——记成都互利信托公司存亡始末·····	姜梦弼 (71)
黄埔中学与陆军军官学校·····	范裕臻 思品端 刘钟灵 (82)
声誉卓著的成都中医药大学·····	张慎沅 (95)
成都市楞伽庵街中学简介·····	张志英 (102)
捐资兴学嘉惠士林的孙德操先生·····	李有为 (110)

青羊区中医医院的由来和发展	苏小波 (115)
解放初对旧医务人员的教育改造	曾淮浦 (121)
现代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先生的一生	李豫川 (125)
观电影《鸦片战争》忆往事	庞孝益 (135)
从《竹枝词》看成都旧时过年之民俗	徐稀星 (140)
古少城与丰富多彩的成都方言	潘前春 (145)

“川西边地下党留蓉临时工作部”活动回眸

邹趣涛

成都历来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个革命时期，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以成都为活动中心的四川地下党在解放前夕的1949年，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时局变化和尖锐曲折的斗争历程。现仅就我个人所参与的一些活动，如实记述如次，以能对后人有所裨益。

自从1949年1月，川康特委蒲华辅、华健被捕，马识途、王宇光离蓉去香港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以后，成都地下党就化分成许多单一组织进行活动。为了慎重、机动，这些单一组织，都出现了一个共有的特征，无不加上“临时”两个字。在这特定历史背景下，川西边地下党，组成了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李维嘉为书记，周鼎文、李安澜为副书记，在川西地下党直接领导下，临工委在川康交界的地区建立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以李维嘉兼政委，肖绍成任司令员，周鼎文兼副司令员，下设有峨山支队、岷江支队、大渡河支队、川东支队、川北支队、仁（寿）简（阳）支队、新津支队等，印发了《川康边区人民游击纵队宣言》。（原件现存四川省博物馆革命近代史部）

为了在成都建立一个联系中心，临工委于1949年10月决定组成“川西边地下党留蓉临时工作部”（简称临工部），地点借用成都西胜街金城银行宿舍进步人士王宏实的住所，一切活动秘密进行。临工部由上级党派王逸平任书记，吕振修任副书记，唐会昌任宣传委员，笔者任组织委员。其任务是：（一）

为川西边临工委领导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转送成员，筹集武器弹药、医疗药品与经费；（二）在成都设法保护国家财产和机关档案以待解放；（三）对外围组织的青年学生与店员工人进行鼓动宣传和教育工作；（四）策反川康地方实力派人士起义，争取成都和平解放；（五）领导在附近县区活动的就近三支游击队；（六）掌握文化教育机构，作为掩护地下党群众工作的联系据点。同时，临工部决定建立四个外围组织，即：（一）新民主主义同志会，由邹趣涛、唐会昌具体领导；（二）新民主主义解放社，由王逸平直接领导；（三）新民主主义建设社，由吕振修分工负责；（四）新民主主义实践社，由李唯实负责领导。上级指明：凡参加以上四个外围组织的人员，均须宣读誓词，学习讨论上级发下来的政治纲领，经过考验，确实表现积极，可转为党团员。

一、迎解放，筹物资，支援川康边游击纵队。

为了迎接和配合西南的解放，川西边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组成后，就以川康交界的雅安为指挥中心，开展了这个地区的游击活动，需要的人力物力如队员、武器、弹药、医药、经费、宣传品等，除纵队积极筹措外，主要由留蓉临工部负责策划解决。我们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在公开合法身份掩护和外围组织配合下开展了以下活动。

第一，接办“培文商校”，以此校作为掩护联系点。商校以聘请成都市长冷寅东为校长来应付局面。我们暗中控制了训导处与收发室，党组织派我去任教导主任，调来仁寿农村地下党的谢金山老同志为收发，还聘了民盟地下组织成员邓文治、武蜀修等上财会课，派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成员管国双等上政治课。政治课主要讲中国社会发展史，传播解放区情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一时期，培文商校成为川西边地下党与留蓉临工部来往文件传送点，同志们的住宿地，物资的储运站。留蓉临工部的同志筹措到枪枝、弹药、服装，秘密存放在一间储藏室内，即派专人通知，由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周鼎文同志带领十几名队员，化装成“鸡贩子”模样的商人，挑着大箩筐，背着大背篋，黄昏进城，深夜出城，把枪支弹药等顺利运往游击区。

第二，秘密建立小型铸造银元的工厂，筹措经费。194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在灭亡前夕，滥发金元券、银元券，钞票贬值，形同废纸，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地下党的活动费用筹措也日益困难，不得不采取铸造银元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借用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会员牟锦熙在红石柱正街崇德里9号的住家，作为铸造银元的地下厂址，由成都拱背桥造币厂找来熟练工人余顺清等，资金是由有联系的人士刘元璋、李光普、杨洛、金铸等分别捐赠或买卖香烟的盈利，约有硬币数千元之谱。当时成都市场极为混乱，为获暴利而造银元的处所很多，无论规模、资金，我们这个临时凑合的地下小厂尽管比不上，但也解决了川西地下党所需费用，不但留蓉临工部本身需要的各项开支得到帮助，还支持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一批帆船银元。

二、巧妙斗争，保护国家财产和档案文件。

我们通过一个与临工部有直接联系的省参议会的小派系“公诚联谊会”的活动，提名促成冷寅东为市长，首先把市政府的机关档案，市警察局的武器、文件，市自卫总队和分队的枪枝和人员，市级银行的金库，市医院的药品和医务人员，市图书馆的书籍等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起来，尽可能在这些部门安插进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

在省一级的范围内，我们依靠有进步倾向的“公诚联谊会”的负责人杨啸楼、张熙民和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社”的成员，省议会的一部分参议员去工作，如卿俊、赵星州等，他们在保护国家财产和省级机关档案文件方面，提供了线索，而且还联系一些有上层关系的省参议员，在参议会上与国民党顽固派、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如王陵基要在省参议会上提出什么“勘乱建国粮增加一百七十万石”的议案，他们就联名加以否决。这对已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有好处，也是对反动派“勘乱剿共”政策的一次打击。

三、广泛开展群众活动，领导外围组织扩大革命影响。

我们在那不长的时间里，联络省议会的人士，以“公诚联谊会”为中心，发展建立“成渝两地省市参议员联谊会”，利用这一特殊关系，油印的《新民主主义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宣言》、《刘伯承邓小平北京广播》、《吴玉章告全川同胞书》等宣传文件，经常出现在省市参议员办公室的写字台抽屉里，弄得反动派惊惶失措。另一方面，为了筹措活动经费，我们又策划建立一个以金融界与军政界参加的组织——“党社”。参加的人有西康财政厅厅长李万华、济康银行经理徐志翔、和成银行总理吴晋航、二十四军副军长刘元瑄、一三六师副师长肖绍成、宁属屯委会主任秘书伍柳村等，由临工部派出宣传委员唐会昌领导，还借新开街济康银行的楼上开了成立会，此后在经济上这些人士都分别出了力。唐会昌同志1940年至1946年期间分别在雅安、西昌的《新康报》和《健康报》作主笔，这些人士对他都有一定的信任与联系。

同时，我们留蓉临工部几个成员，分工领导了三个外围赤色群众组织，参加的对象是工厂工人、企业店员、学校学生、

机关职员和家庭妇女。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就依靠这批群众，冲破了黎明前黑暗沉闷的局面，开展了这座文化古城里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他们有的去组织“读书会”，研究马列主义著作，有的去搞油印机，刻蜡板，联系可靠的印刷厂，印刷宣传资料；有的被派遣打入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游干班”，了解情况，搜集情报；有的赴川西边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英勇战斗，为迎接解放，作出贡献，光荣牺牲的，不乏其人。

四、川东南游击队的曲折变化和艰苦卓绝的斗争。

由于川西边地下党临工委领导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总部设在雅安，距离成都较远，联系指挥不便，因而决定川东南各游击支队划归留蓉临工部直接领导。首先是仁简地区活动的川东第一支队。1949年11月底，支部决定派出宣传委员唐会昌与郭诚（郭曾在松、理、懋山区搞过游击队活动）两同志率领“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进步群众曾尔宜、卢家熙、倪学华、张国宾、古振华、李政、刘静辉、黄再惠、李义洁、周骥、张中林、严弘、王化十三人作骨干前往开展组织发动工作，临行时借用了有关系的国民党新十一军的军装，把这批人化装起来，顺利通过了成都东门的检查与沿途的封锁线，到达了简阳贾家场槎耙坳，把带去的宣传品《解放军约法八章》、《刘伯承邓小平告四川军政人员书》、《吴玉章告四川父老书》、《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宣言》以及枪弹、银元安顿在兴隆场袁家坝刘家祠里。据群众调查反映，国民党嫡系部队胡宗南有个秘密电台在兴隆乡一个院子里。一个深夜，游击队和当地群众，团团围住这个院子，经过一阵战斗，缴获了这个电台，还抓获了少将高参白霭真等七人，押送贾家场二野战斗前线指挥部。在旗开得胜的形势下，游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谭罐、武庙、玉成、芦葭等镇和金莲花、石堰、三岔各乡，分别

建立解放委员会，将五百多人的游击队改编为县大队，继续担任城防、治安、催粮、运粮、清匪、平叛工作。这些工作告一结束时，本乡本土的游击队员就安排在简阳县区乡镇工作，临工部派去的十三个同志回到了成都。

以“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会员聂生明为政治指导员，高沛成为支队长的游击第二支队，在仁寿高家场一带活动，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在安县、北川地区，活跃着一支由“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会员方周联系发展起来的川北支队，由党员宋达任政治指导员，刘丕丞为队长，有人枪七百余众，在破获特务潜伏电台、堵截敌二十军军长景嘉漠部的溃军、协助解放军在安县北川办理接收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得到川西军管会公安处的嘉奖。

彭山游击支队是由郭诚请示临工部批准，派出“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会员商家盘同志任指导员，曾国熙任队长，组成川南人民游击支队，在当地迎接解放，牵制和分化国民党反动势力，为解放彭山做了有益的工作。

五、做好策反工作，迎接成都解放。

1949年12月7日，东路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川东云阳、川北邻水，在重庆成立军管会。北线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秦岭南下，解放陕西重镇汉中。川西边地下党留蓉临工部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除了留下通讯联络同志外，加紧了川康地方势力驻蓉部队的策反工作。王逸平、吕振修和我，在成都永兴巷川鄂绥署主任潘文华公馆“檀苑”召开会议，商讨阻击胡宗南残部向雷马屏逃窜的方案，商讨保卫成都、维护治安、免遭破坏诸问题。参加紧急会议的有川军二十八军副军长杨晒轩、联勤补给区司令曾庆集、七十二军的代表卿俊、罗广文兵团的代表谢宜、二十四军的代表王作宾，以及几个保安团的代

表张馥波等。会议决定推杨晒轩为指挥，曾庆集为城防司令，以黄花馆的五十九军军部为据点，即派人通知成都市市长冷寅东属下的成都自卫总队接受城防司令的调遣。

7日下午，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在成都发布命令，命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王缙绪为成都游击总司令。留蓉临工部连夜召开支部会议，进一步具体分析形势，曾设想布置以北较场军校学生军与警卫蒋介石驻处军队为内应，以有策反关系的一个炮兵团和九十五军一个守凤凰山飞机场的团作配合，发动“成都事变”，活捉或炮打蒋介石。后接上级党的指示而停止了这一秘密行动。我们临工部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抓川康地方势力的策反起义上来。乃于8日上午，王逸平与我穿九十五军的军服离开成都，在新都斑竹园住一夜后，于翌晨由陈离先生陪往新繁龙桥小学会晤刘文辉与邓锡侯两将军。接谈之后，他们当面交一个亲笔条令：“二十四军与九十五军交由王骆（我当时化名骆志成）两同志全权指挥调用。”我们赓即回城，分头传达布置后，于当天下午到了彭县龙兴寺川康起义的中心指挥点，会到地下党的其他同志洪宝书、詹大丰、朱德钦和解放军二野派来的鲁侠，共同组成综合小组来领导这次川康地区的起义工作。首先成立一个川康起义委员会，由邓锡侯任主任（原在地下党综合小组研究时，认为刘文辉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就在武汉与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开始联系，本拟以刘为主任，因刘卧病在龙兴寺方丈室，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诚恳表示：“从实际考虑，最好改推晋康出面多招呼一些日常事务为好。”）刘与潘文华任副主任。下设五个处：参谋、组织、宣传、总务、联络。在一系列大小会议准备起义工作中，首先在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布置和警戒：即以邓部九十五军一二六师一个团警卫彭县。刘则利

用他带来的电台，急电雅安、康定、西昌的驻军，作好起义准备，并命令成都武侯祠守卫部队准备，等候彭县的新指示。邓部九十五军副军长谢德堪率领驻广汉部队一二六师速移彭县，又令邓部驻新都的六七三团向西移至彭县濛阳镇，作好戒备。把车伯常团布置在郫河一带作为第三线。同时电令邓部一二五师于戒虚师加强彭灌之间的军事联系。潘部的二三五师师长在南部接到命令，即派其七〇四团团团长王敬夫到南充与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接洽起义，全师移潼南待命。为了预防胡宗南军队袭击彭县起义中心，又从九十五军抽调一个加强营，由绰号“李毛牛”的勇将李勋伯带到彭山海窝子，作为第三线。

考虑到刘、邓、潘几十年来在川康地区有一定号召作用，地下党综合小组建议他们先把起义通电发出来，不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幻想，而且可以推动一些还在徘徊犹豫的部队下决心。其时刘文辉已拟好一个初稿，在讨论电文稿，对蒋介石称呼上费了不少时间，经过工作，说明起义对旧军队来说是一场革命，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最后意见归于一致，终于在12月9日，把刘邓潘三将军的起义通电印发公布。这对于以后国民党川鄂绥署副主任董长安的三万余人21日在金堂、广汉地区宣布起义和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24日在郫县两路口以及陈克非、张仿的起义等都有影响。此中，综合小组曾接到罗广文、陈克非兵团的通知，说他们上中级军官有不稳定情况，派我到郫县驻防进行宣传政策工作。当吉普车把我送到郫县县府会着罗广文、陈克非时，他们望我先约集两部师旅长们举行座谈，然后下连宣讲。我除了将带去的《解放军约法八章》、《刘伯承邓小平北京广播》、《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宣言》、《刘邓潘起义通电》交给他们学习外，还在师旅长会上讲解我党对于起义人员的方针政策，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种种问

题，解除各种疑虑。临行要他们在一张起义宣言上签字时，有三个师旅长泪流满面，右手发抖，签不上字。我把这三位军官约请到县政府会客室，详细讲明政策，解除了他们的顾虑，终于顺利地起义宣言上签写出部队的番号、头衔和姓名。我回到彭县龙兴寺向四川地下党综合小组汇报，又到卧病的刘文辉、起义指挥部办公室的邓锡侯、寄住北街私人寓所抱病的潘文华等处，分别作了通报，大家放下心来，无不为去掉后顾之忧而高兴。

1949年12月底，成都获得和平解放，无往而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南北夹击的战略，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川康将领认清时局及时起义，也功不可没的。正如1950年春，贺龙元帅在成都一次宴请起义部队师长以上军官座谈会上所讲那样：“成都解放，川康地区所有军政领导人起义的影响，政治上大于军事上。”这是高度的结论，如实的评价。

赞天府广场

天府广场绽新颜，
万幢高楼拥翠坛。
萋萋芳草连天碧，
静谧清幽大自然。

十八军川西剿匪及进藏准备

魏 克

1949年底，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十八军指战员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师川南地区驻防，迎接开辟地方工作的新任务。1950年1月7日，部队在行进途中，突然接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发来“停止待命”的急电，并让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及各师主要首长去重庆受领新任务。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向十八军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赋予十八军进军西藏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由于新任务来得突然，全军指战员的思想弯子一时转不过来，张军长、谭政委等首长亲自深入各师动员，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随着部队的思想迅速扭转，进军西藏的组织、物资等准备工作也同时紧张展开。

就在这时，川西各地匪患蜂起，仅邛崃、大邑地区大队以上的土匪就达40余股。这些土匪是在成都战役后，由一些溃散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少数反叛的起义部队和当地惯匪、封建帮会势力、恶霸地主相勾结，在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策动下组织起来的以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他们公开大肆烧杀抢劫，残害基层干部和群众，袭击我人民解放军，活动异常猖獗。2月中旬，张国华军长带作战科长顾草萍同志由驻地乐山去重庆开会，原打算到新津乘飞机去，后因故改道从成都去重庆。张带了两个排的兵力，从乐山出发，沿途竟被土匪阻拦，六十二军又派了7个连护送，边走边打，当晚才走到双流，第二天到成都，后由护送贺龙司令员到成都的一个营，护

送张军长到了重庆。土匪武装残酷杀害地方干部，猖狂围攻名山县城3天，烧了东大街，在五十四师一六二团的一、三营赶到才解了围。匪首叶瑞廷率1200多土匪攻打邛崃县城两天，五十四师一六一团在阴历腊月30日才赶到，经过激战，把土匪击溃。因土匪破坏公路、毁坏桥梁，炸毁飞仙关铁桥，2月3日，由十八军派出的以陈子植、陈竞波二同志率领的进藏先遣支队被阻于雅安，原定去甘孜的支前司令部也被阻于新津，所需的进藏大批粮食无法筹措，各种支援进藏物资也不能按时前送，严重影响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延误了部队行进的日程。

为迅速剿灭匪患，西南局、西南军区于2月初作出了全区剿匪的部署，根据匪特的多少和活动规律，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匪特实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西南军区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对大股匪特进行重点围剿。2月26日，西南军区电示：“川西匪特之猖獗，已影响到我十八军入藏之实际行动，故决定十八军立即全部开展于成（都）雅（安）公路两侧及新津、眉山地区，以一个月的时间，负责剿灭上述地区之匪，尔后再作入藏行动。”电报规定，在上述地区剿匪“由川西军区直接指挥。”同日，西南局、西南军区报告中央军委，由于十八军已参加剿匪，加之粮食困难等原因，建议推迟进藏时间。

张国华军长在西南军区受领了参加川西剿匪及研究了进藏任务有关问题之后，于2月21日，回到乐山。遵照西南军区的部署，军部于3月2日发出剿匪命令，全军立即从进藏紧张而繁忙的准备工作转入执行剿匪任务。当时，我是五十二师的宣传科长，亲身经历了这段任务交错、紧张而艰苦的历史。根

据军部的剿匪命令，五十二师一五五团于3月中旬，从乐山牛华溪出发，先将活动在思蒙至眉山的21名土匪全歼，又赶至洪雅柳江、宝珠寺、柿子岗将匪首2名、匪众32名捕获，又在霍坪、汉王寺两地俘获土匪头子、恶霸地主张炳南，打死2人，捕获27人。此时，眉山军分区报告几千名土匪占据多悦镇，师部令一五六团和一五五团二营，在一五六团团团长王立峰指挥和眉山军分区教导队的配合下，长途奔袭多悦镇，土匪一触即溃，部队随即在多悦镇附近地区清剿，发动群众，俘虏国民党残军中将1名、土匪骨干200多人。在此基础上，一五五、一五六团分别在洪雅、丹棱、蒲江等地转入驻剿。五十三师于3月8日，进入剿匪区域后，在洪雅以一五七、一五九团从南北合击总岗地区，一举歼匪400余人。11日，一五七、一五八团又合围百丈股匪，歼灭200余人。然后在名山、邛崃、芦山地区驻剿。五十四师早在2月中旬，就奉命进入名山、邛崃两县，对这一地区3000多人的股匪进行围剿，21日，在开进途中歼匪300余人，尔后经孔明庙、白塘井、高埂子、大兴场、马湖营、东岳镇等10余次战斗，至3月下旬，共歼灭匪特2808人，有力地打击了匪特的嚣张气焰。

3月2日，中央军委在批复西南局、西南军区2月26日关于推迟进军时间的电报中指出：“十八军在蓉（成都）雅（雅安）间大体完成肃清土匪任务后，应分批设法前进，现在雅安的两个团（原准备3月份进至雅安的一五四、一五七两团，当时尚未到达），应向甘孜前进。”随着整个川西剿匪的胜利进展，成股的匪特基本瓦解，由成都至雅安的公路已经打通。十八军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南军区“应分批设法前进”的指示，经过准备，于3月29日，派出以军副政委王其梅、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同志率领的军前指，自乐山乘车出发，31日抵